

故园风雨

冀访 著



故 园 风 雨

冀 沅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邮政编码: 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厂 北京隆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32开

字 数 332千字13印张

版 次 1989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30074-078-1/I·60

定 价 4.90元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 迅

第一章

1

酣睡中的田彩，忽然觉得列车靠站了。到啦！到啦！一种期待许久的欢乐，着火似的在心里点燃，越烧越旺，越旺越亮，不知道叫出来好，还是笑出来好。接着冒出一个念头：“我要看，我要看，看我的故乡！”但怎么也睁不开眼睛。她还没有完全清醒。她挣扎着，就象开启千斤闸门一样，眉头紧皱又紧皱，眼睛好不容易睁开了。某种紧迫感驱使她一骨碌坐起来，却没有忘记习惯地用双手拢拢长发。

火车果然停靠在一处车站。站台的灯光从窗口照进来，也传来嘈杂的人声，来回跑动的脚步声。夜风吹到身上，颇有几分寒意。她看手表，零点刚过。她明白这是自己搞错了。现在还是黑夜在统治。列车开出广州才八个小时，到石函市必须睡一夜，还要熬过整整一个白天哩！

“我太紧张！”她心里说，无声地笑了。

她弯下腰，俯视睡在下铺的钟老师。钟元坤女士侧卧着，脸庞朝里，睡得十分安祥；再望望睡在对面上铺的何毓秀女士，英国医生希尔的华裔夫人，也睡得正香。原来希尔太太还是一位打呼噜的高手，鼾声响亮而均匀，尾音拖得特别长，具有一种特殊的韵味。睡在太太下铺的希尔医生却醒着的。他那两条毛茸茸的手臂放在毯子外面，一只手搁在胸前，一只手压着下腹，象在专心致致地欣赏老婆的鼾声，又象在做祷告，或者思考什么问题。

当田彩的目光落在他脸上，他调皮地眨眨眼睛，笑了。那紧贴上唇的又密又浓的一撮黄胡子，也渐向两侧延伸开来。

“Good morning, Miss Tian! （早上好，田小姐！）”

“Morning, Doctor Hill! （您早，希尔医生！）”
田彩应声答礼，语音节奏很快。

“Excuse me, But would you Kindly tell me where the train stops? （劳驾，车停在哪儿，能告诉我吗？）”他的指头轻轻在胸脯上弹叩着。嵌在金戒指上的一颗大宝石在微弱的灯光下熠熠闪亮。

“Sorry（对不起）！”田彩灿然笑着，双手撑着床沿，腰肢一闪，迅速跳了下来，那动作象跳马运动员一般利索。Well, let's me ask other people（嗯，让我问问别人。）”她系紧睡衣带子，趿着一双在香港买的高跟拖鞋，轻捷地走了出去。

立在车厢门口的乘务员向她招呼：“您会着凉的！”她向那位一团和气的姑娘摇摇头，挥着手，笑笑，下了车。

出乎她的意外，站台上竟然非常热闹，灯火通明，简直象雅加达的巴杀（Basar，市场）。每辆流动售货车都被旅客们包围着，再也无法流动了。每节车厢门口，人们上上下下，异常拥挤。相形之下，她乘坐的那节车厢却显得那么悠闲；虽然觉得有些奇怪，却没细想。广播喇叭在向旅客问好，表示欢迎，详细介绍这座城市的交通、旅馆和风景名胜。这座城市叫什么名字呢？田彩站下来听。播音员一开始就说过了，好象有意和她作难，怎么也不愿意再重复一遍。算了，去问别人；不，不必问，还是自己寻找那块竖立在车站旁边的站名标牌吧！这里是祖国，从踏上广州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回到了祖国，世世代代叨念的那个“唐山”。海外的唐人，只要说起“唐山”，便会泛起强烈的向往，有时还夹杂着怎么也说不清的一缕一缕忧伤之情，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唐山，但在梦里却经常回到唐山，不必别人指点，似乎

早熟悉了唐山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因为他们的“根”深深扎在这里。这种源远流长的联系，决不是悠悠岁月能够割断的。田彩也算这些人其中的一个。

田彩非常兴奋，也因为觉得有些寒意，便越走越快；高跟拖鞋在站台的水泥地坪上发出快节奏的“啪哒，啪哒”声，又穿着一身睡衣，满头浓密的头发一直披垂到腰肢下面，自然引起了许多旅客的注意。她自己一点也没察觉，只感到心里很快乐，因为已经回到祖国，一定要亲自找到这个车站的站名标牌。不知不觉走到了站台尽头。一位穿制服的铁路职工拦住了她。

“小姐，您到哪里？”他自然是从她的衣着和风度，认出她是从海外回来的。

“我找标牌。我想知道这个车站叫什么名字？”她的普通话讲得非常流畅。

“哦，这个呀……”

“不，不要告诉我，我要亲自看见它！”不理解这种心情的人，一定会认为她固执得太可笑，不近情理。

“看上面呀！”那位铁路职工果然忍俊不禁地笑开了。

灯光照映的候车室门楣上浮塑着四个红彤彤的大字：衡阳车站。

“谢谢！”她也忍不住高兴地笑出声，向那位铁路职工鞠了个躬，然后回转身，跑了起来。

她一面跑，一面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这个地名：衡阳，衡阳，这就是说，这个车站在衡山的南面吧！小时候老师教地理课，使她知道中国有“五岳”，衡山是“五岳”之一，南岳衡山。事隔这么多年，忽然又记起来了。

一辆被旅客们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售货车吸引了她，于是她也跟在别人后面挤上前去。原来这些过路客人在争购一种名叫“无核密橘”的土特产。她的印象里只有暹罗大橘子，这么小巧玲珑的，还是头一回见到。既然大家争着买，那一定就是好东西。她决定买一堆，让同车厢的人品尝品尝。一个跟一个，好不容易挨

到她。这是回祖国后头一回排队啊！她却忽然惊叫一声，接着又笑了——下车的时候没有把钱包带在身边。争购桔子的人突然失去了挤劲和抢劲，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她。她才意识到自己穿着一身睡衣，趿着一双拖鞋。居家时，只有在卧室才这么装束，走进客厅也不适宜的；由于疏忽，此刻竟把众多同胞们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了。一种失态之感使她羞怯，脸庞也觉得在发烫。她连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不无几分狼狈地退出了包围圈。其实，同胞们所关注的何曾只是这个问题啊！

2

田彩回国，是专为探望大哥田杉的。田杉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回国，她出生于日本法西斯投降后的次年，兄妹俩相差二十四岁，一直没有机会见面，至今还算陌生的亲人。田杉的模样，她是从相片上认识的，田杉的为人，也是从他写给家里的信中知道的。但这些都是幼年时候的印象，早已模模糊糊，似有若无。记忆里最清楚，成为永久烙印的，那是她十一岁时发生的那场家庭灾变。

那年春天，田杉突然中断了来信。写信催，发电报问，都如石沉大海。当时二哥田彬在雅加达经营一份《华光日报》，自任社长、总编辑，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知道的；大哥碰上什么麻烦，他也估计到了；但他和二嫂封锁消息，并不告诉妈妈。二哥只单独找爸爸聊些什么。聊过之后，爸爸的脸色总是蒙着一层忧郁，显得心情沉重，却也不肯向妈妈透点风声。有一天，妈妈忽忽然问她：“彩彩，你们学校的老师讲不讲唐山的新闻？”田彩睁大眼睛想想，好象讲过一些，她没有兴趣，也没记住，当然更不懂得那种“新闻”会与大哥有啥关系。妈妈央求她抽空瞧瞧报纸，因为妈妈自己不识字。她看了二哥办的《华光日报》，还是不得要领，没能解开妈妈心里的疙瘩。后来，报社驻在香港的特派记者钟元坤小姐回到雅加达，带来许多香港、澳门和大陆出

版的报纸，有些报纸登着批判大哥的文章，二哥无法再隐瞒，也觉得没有必要继续隐瞒下去，全家人这才知道大哥在国内闯了祸，，遭了灾。它的分量象恶耗一般沉重，妈妈先哭，接着爸爸、二哥和二嫂也哭了。田彩跟着哭，但她只是见全家人伤心，自己也伤心，当时并没真的感受到那份重量。随后的日子里，二哥的朋友传来一些华侨社会的风言风语，什么“看那份《华光日报》怎么办下去”啰，“大陆共产政权也不给海外左倾人物留点面子”啰，“这就是左倾的好下场”啰，等等。二哥的脸色也变得一天比一天阴郁，常常一连几日不去报馆办事。

爸爸田立本，战争期间被日本占领军长期监禁，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身体羸弱，忧伤中旧病复发，进了医院；次日，由于大量咯血，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对于田家，这无异世界末日降临！

这个非常时刻最有发言权的人，也有能力对哀伤和惶惶中的田家起到稳定情绪作用的人，只有大律师丰永臻。他是田彬的岳父，《华光日报》最大的股东，女儿丰珍妮又担任报社经理。律师精明能干，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要田彬继承父业，同时为他兼营房地产买卖，并且停办那份招惹是非的《华光日报》（此举在八年之后变成了丰大律师的另一份“资本”：一九六五年苏加诺下台，印尼当局猖狂反共反华，田彬竟安然无恙，难道这不证明他丰大律师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么？）。报馆的职工全部遣散，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钟元坤小姐；她原是田彬在上海读华夏大学新闻系的同学，接受他的聘请来印尼的；但也还是倚仗大律师的面子，在一所华侨学校当了教员。田彩进中学，她就变成了她的老师。

田彩十一岁时发生的家庭变故，长大后虽然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由于全家都忌讳，她只好闷在心里。

岁月流逝。时间是最好的淡化剂，不论多么沉重的痛苦和悲哀，它都有能力加以稀释；那进程虽然缓慢而漫长，最后总能使它在人们的记忆里达到临界遗忘的程度。在田家，田彬事件自然

也不例外，在老老小小的思想感情上渐渐沉淀了，渐渐冷漠了，好象家里从来不曾有过这么一个人。人们忙于自己的事情，生活着。人们在各自的生活领域里有了新的各式各样的喜、怒、哀、乐。该老的在老下去，该成长的在成长着，该诞生的诞生了。

历史的悲剧往往会以喜剧形式来结束。相隔二十二年之后，料想不到竟从唐山陆续传来许多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使田家重新记起了田杉——一位不幸的儿子、不幸的兄长。新一代的田充和田允，这才头一次知道，原来唐山还有一位不幸的大伯伯。于今他死了还是活着呢？这是全家人急于要知道的。但反复合计，那结果总是三分欢喜七分愁啊！经过母亲的一再催促，田彬终于鼓起勇气给田杉原来教书的石函师范大学寄了一封信。这不过是向深不可测的井里投一块石子，试试它会不会有反响，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然而，意外地收到了田杉的回信。这封信写得非常简单，只说自己的问题得到了“改正”、“平反”，已经回到原来工作的学校。再没有其它附件，例如照片之类；也没有谈及家庭成员的情况。尽管如此，它依然星火燎原似地燃起了“田杉热”。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七九年一月某个晴朗的早晨。这天变成了田家的盛大节日。田彬和田彩，分别给雅加达的亲戚、朋友和同乡们打电话，通报这一特大的喜讯，宣布这天为“家庆日”，邀请大家准时到豪华的孔雀饭店参加庆祝晚宴。接到通知的人全来了。丰永臻大律师更是精神矍铄，显得年轻了许多。

客人们说过庆祝之类的吉祥话，便集中在什么叫“平反”？什么叫“改正”？它们有没有区别之类的问题上议论开了。多数人一辈子生活在海外，对中国的情况十分隔膜，只听说国内一时期有一时期的“分子”，名目很多，不知道“右派分子”算不算犯人；如果算罪犯，他们的罪恶究竟有多大、多重呢？比强盗、土匪怎样？比造反、叛国怎样？……在印度尼西亚法典上，显然没有什么罪行可以当作例子来比较，于是“平反”、“改正”也就成了含义不明的概念。是不是象特赦、大赦那样，虽然都是

“赦”，但免罪的范围是否不同呢？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丰永臻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听着，吃着菜肴，喝着自己欢喜的法国葡萄酒。他也遇到了法律上的难题，在思考着。人们议论一通，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只好请教这位年高德劭的大律师。

“这个嘛……”丰永臻沉吟着。这位博学多才、大名鼎鼎的律师，也不能从自己的法学仓库里找出这样的概念。“再让我想一想，想一想吧！”继续苦思冥想。

人们满怀希望，安静地望着他。其中不少人就是聘请他担任常任法律顾问的雇主，虽然决不会有人要他为“右派分子”辩护，但也总不能当众坍台呀！

“平反者，理正幽枉也！”半晌之后，丰永臻终于念了一句古文。“也就是说，把冤屈错判的案件改正过来。如果‘平反’是改正误判，‘改正’就是平反错划呗！”这种解释等于没有解释，自己先笑了。

客人们附和着哄笑，高高兴兴地立起，互相碰杯。人们不想深究，更不愿抹大律师的面子。

另一席全是女宾。幸福的母亲是中心人物。她快乐地接受客人们的祝贺和敬酒，向她们叙述田杉的往事。在妈妈心目中，即使儿子老了，也永远是个小孩。她说起田杉童年时代的淘气行为，许多叫她呕气的事情，都象发生在昨天一样，心里乐滋滋的。

“没见过这样调皮的孩子呀，从小就会折磨人！”母亲接受婴孩的折磨，也算最大的快乐，所以她笑了。“他嘴里衔着奶头才肯睡觉。后来他睡着了，我也睡着了。我朦里朦胧翻个身，他朦里朦胧以为我要抽出奶头，就是一口，咬掉了一半……”

“妈，您可叫起来了！”田彩大声笑。

“疼啊，流了好多血！后来还肿了，住了两个礼拜医院。”

“妈，这叫自作自受！”田彩口齿伶俐而锋利。“他出了牙齿，为啥还不断奶呀？”

“死丫头！”妈妈啐道，“你没生过孩子，哪知道……”田

彩是结过婚又离婚的。

“妈呀！”田彩耍泼了，一头栽在母亲怀里。“只准说大哥的故事，大哥的……”

女宾们凑趣地笑着，劝说着。

“看你，三十岁的人了，还象小孩子！”妈妈抚摸女儿的秀发。“大哥是头胎，我不忍心给他断奶。他也真象个蛮子，我没奶水了也要空嚼。四岁时候，生了你二哥，又有了奶水，便分着吃。有一回，正在喂你二哥，他跑过来，把弟弟推开，一个人霸着吃！”

全体女宾又一次快乐地笑了。在男宾那边陪客人的田充和田允也赶来凑热闹，笑他们的陌生的大伯曾经是个蛮里蛮气的孩子……。

“家庆日”之后，妈妈有了新的心病：急于回国看望大儿子。对于这个问题，田彬不敢随便作出决定。他承认自己对国内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有一点自认为看准了，那就是：中国的政策常常会出乎意外的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贸然回去，如果赶上了趟，岂不是自投罗网？这时候，钟元坤恰好接到青年时代的密友来信邀请，决定回国观光、访旧。她的这位密友于今是位侨务官员，石函市侨联主任，和田彬同在一个城市里。田彬和妈妈商量之后，决定先叫田彩跟她的老师回国一趟，亲眼看看中国的实际情况，然后再决定他和妈妈是不是也应该回去转一转。生活把田彬训练得老成持重，遇事皆三思而行，不做蚀本买卖。就这样，田彩作为全家的代表，也作为钟元坤的旅伴，开始了这次带着“探险”色彩的旅行。

3

田彩终于冲出好奇人群的包围圈，回到了车厢里。

希尔夫人、何毓秀女士和钟元坤都醒了，两人躺在铺上闲谈。希尔医生则躺在铺上吸雪茄，那么悠然自得。田彩又兴奋起来。

急于把自己的“心得”和“发现”告诉他们，但上气不接下气地笑着，竟把要说的话堵在喉咙里。

“Miss Tian, I've already known……（田小姐，我已经知道……）”希尔医生抢先开口，并且胜利地笑着。

“Then, Do you know what does the word ‘Heng yang’ mean（您明白‘衡阳’是什么意思吗）？”她迫不及待地打断医生的话头，大动作地做着手势，然后提高声音：“Southern rich area of the Heng Mountain（衡山以南的富饶地区）！”象裁判对犯规的运动员宣布处分那样，一连重复几遍，生怕对方不懂。

“才到衡阳呀——”何毓秀慢条斯理地拉起上海腔，似乎有意把尾音拖得不能再长。她显然对田彩的“心得”和“发现”毫无兴趣。“衡阳离上海交关远，还有株州、上饶、衢州、金华、嘉兴……许多地方要停靠。依放心困觉好啦，就怕依没困觉的福气——”又是一个长得要命的尾音。两年前，医生来中国讲学，她陪着丈夫乘过这次火车，所以能够背出沿途的许多站名，在两位初来者面前炫耀自己的“老资格”。

田彩被这位欢喜卖弄的胖太太败坏了胃口，不想再说什么，爬到自己的铺上躺下。何毓秀继续用上海话与钟元坤交谈。田彩惊奇地发现她的钟老师也会说上海话，尽管费劲地细听，还是半懂不懂。火车启动了。轮子在钢轨上滚动的声音也算有节奏、有韵律吧，然而单调乏味。随着噪声的加强，她们的谈话变得更难听清了。上海话也是祖国的语言，怎好不懂得呢！对于祖国的一点点，她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幸而何毓秀精力旺盛，努力提高音量竟然压过了车轮滚动的噪声。田彩边听边琢磨，试着把上海话词汇替换成普通话词汇。但何毓秀被下铺的雪茄烟薰得呛起来了。

“No smoking, no……（不要吸烟，不要……）！”何毓秀向丈夫抗议。

乘夫妇俩办交涉的时候，钟元坤转身朝里。她实在太困倦，不愿意仅仅为了礼貌的缘故，强打精神听胖太太漫无边际地唠叨下

去。何毓秀失去谈话的对手，这才沉默了。真是胖人多福，不到一分钟就打起了呼噜。接着，希尔医生也打起呼噜，不仅比胖妻子的更响，而且沉重得 颇 够 分量。上铺和下铺一呼一应地呼噜着，有时上铺和下铺同时呼噜着，表演起男女声对唱和男女声二重唱了。鼾声比车轮滚动的噪声更令人讨厌。田彩无法入睡，干脆在想象中描绘起即将会面然而跟陌生人一样的大哥来了。

大哥是一副啥模样呢？她见过的只是田杉青年时代的照片，那模样跟田彬很象。按照这个逻辑，现在的田杉也应当跟现在的田彬不相上下，因为他们只相差四岁。然而大哥坐过牢，受了几十年的苦，那就无法跟二哥相比了。妈妈曾经叫二哥写信，要他寄张“全家福”来看看，他就是不肯寄，回信只说有个幸福的家庭，除了小女儿在念初中，都有工作。当然好啰！他回到了原来居住的城市里，回到了原来教书的大学里，并且恢复了讲师的薪水（不懂得他为什么把它说成“工资”？难道讲师跟工人一样？——想到这里，田彩不理解地笑了），而且说是“六级讲师”。她不知道这算不算高级讲师，再往上提就是副教授？哎，何必管这些呢，多余的！他既然是讲师，总该有一幢带小院子的住宅，种着自己欢喜的花草。那住宅可能不太宽敞，也可能不十分漂亮，至少也是包括门厅、书房、卧室……，一幢合乎讲师身分和需要的房子啊！二十多年来，大哥蹲在监狱里，当然很穷，买不起象样的家具，生活也不会过得很宽裕；不过二哥告诉过她：大哥有一位美丽的嫂子；美丽、智慧，常常和才能结合在一起，只要这些年来她还是嫂子，现在这个家庭也不会差到那里去的。何况离开雅加达的时候，二哥一再吩咐过：要留心大哥家里缺少些什么，帮助他办齐。二哥还说：中国还没有私人小汽车，倘或大哥需要，下次和妈妈回国的时候，可以在香港给他买。二哥想得真周到啊！这样做，虽然弥补不了几十年的损失，但多少能够给他一些安慰吧——在这世界上，他并不孤独，还有妈妈想着他，弟弟关心他，妹妹远涉重洋来看望他！

是不是也把妈妈讲的，他小时候顽皮的故事告诉他呢？那些

事情也许他早忘得干干净净，再讲给他听，他和嫂子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侄儿、侄女们听了，说不定还会哈哈大笑：看哦，我们的爸爸小时候原来是这副德行！……就要见到，就要见到，头一句话说什么呢？火车轮子在钢轨上滚动的声音就是：“就要见到，就要见到……”。她在不断反复的“就要见到……”的声音中睡熟了。

第二章

1

从广州开出的第50次车到达石函市的时间是傍晚七点四十分。下午三点才过，齐鸣便开始忙碌起来，拣出要穿的衣服，在手提包里装进一切应该带在身边的用品，梳头发，施脂粉，最后找出那双只穿过一次的高跟皮鞋，望着它忧虑起来了。平日不愿意穿它，觉得那款式太“洋”，今天看来看去，又嫌它太“土”。她要接待的客人钟元坤，并不是来自北美西欧的贵宾，不过是位小小的“南洋客”，自己的老同学、好朋友，信里还说她“仍没结婚”，一个老姑娘，本来无须过分拘泥，但她从香港发出的电报却说：同来的还有一个“旅伴”；这位“旅伴”可能就是她的“伙伴”、男朋友吧？那就不便怠慢了。由于工作上的原因，齐鸣接触过和接待过不少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华裔外籍妇女，熟悉一些她们的习尚和喜爱。她对那些色彩非常鲜艳、反差格外强烈的服装，满头、满胳膊都是珠光宝气的头饰和手饰，并不欣赏，认为那是“俗美”，但又不能不考虑这样的问题：今天的钟元坤是怎样穿戴的呢？跟她经常见到过的那些妇女们一样，还是保留着从前的朴素淡雅？她俩毕竟分别了三十一年啊，又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和社会里，如果钟元坤也穿得花花绿绿，原也不奇怪，可自己应该怎样穿戴才合适呢？总不能一见面就让老朋友感到：彼此之间已经拉开了不可逾越的距离。

齐鸣和钟元坤都是苏州城里人，从小同学。小学毕业，两人

一同考进了当时颇负盛名的教会办的东吴女子中学，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同班、同寝室，朝夕相处，亲亲密密生活了六年。这六年是人生旅程中的黄金岁月，是生理上成熟、知识上增长、世界观日趋明朗的分分秒秒。难能可贵的是，在那种封闭型的教会学校里（她俩的双亲正是爱上了那种“封闭型”才把女儿送进去的）她们不但没有从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潮游离开去，恰恰相反，两人都与自己家族的传统日益疏远，最后完全决裂了。她们从不谙世事的小姑娘逐渐变成了有理想、有抱负的女青年。她们的这种不寻常的转变过程是同步的，所以两人的情谊也就与日俱增，远远超过了一般亲姊妹。高中毕业后，齐鸣考进了南京一所著名的教会女子大学江宁女子文理学院历史系，钟元坤考进了上海华夏大学新闻系，两个好朋友这才分手。尽管分处两地，书信来往却非常频繁。寒假、暑假回到故乡，不是我住在你家，就是你住在我家，依然姊妹似的亲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随大军过江的齐鸣，作为上海市军管会的一名代表，接管了一所规模不大的教会医院。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即使上帝开恩，每天给她四十八小时，也无法做完要做的工作，何况局势尚不稳定，那些没有来得及逃出的和奉命潜伏的敌对力量，还在暗中大肆活动，破坏事故时有所闻。为了应付这种非常局面，齐鸣只好住在医院，吃在医院，也无所谓昼夜，无所谓休息日。想去看看在军管会负责外事工作的丈夫，十天半月也难得捞到一次。一天下午，她从军管会丈夫那里出来，乘有轨电车回医院，忽然在众多的乘客中发现了钟元坤。她高兴得大声叫喊起来，并且在钟元坤的名字后面加上了一个当时听起来十分新鲜的亲切称呼：“同志！”钟元坤楞住了：女兵怎么会认识我？再细看，她也认出了对方。两个人隔着拥挤的乘客大声笑，“哦哦呀呀”地互相招呼着，可一句话也说不出，好象数不清的语词同一时间拥挤在声带附近，发生了交通堵塞，谁也无法前进一步。人民群众多么尊重和崇敬我们的解放军，不需要谁的任何暗示，都自觉给齐鸣让道。在解放战争期间阔别了两

年多的一对挚友，就这样在解放后的上海重逢了。

那年由于战局关系，没到学期终了，提前放暑假，钟元坤就算从华夏大学毕业了；但社会动荡不安，国民党政府自身难保，她自然无法找到自己愿意干的任何工作。恰好这时候收到田彬的信，说他在雅加达办起了《华光日报》，急需记者、编辑，邀她前去；只要她能设法到达香港，报社就可以为她解决剩下的一切问题。上海解放前夕，她一直为实现这个目的奔忙着。当时沪、港虽然仍在通航，但海上和空中的交通工具，全为那些急于逃命的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所占用，一个与他们毫无瓜葛、刚从大学出来的姑娘，有什么能耐挤进去呢？解放后，海空交通均被封锁，剩下的唯一通道就是经广州乘船或者搭火车。这样做不仅有很大的困难，而且潜在着难以意料的危险。即使到了广州，也不一定能够顺利到达香港。广州仍是国民党军队沿海的最后据点，摆着负隅顽抗的架势。两军对峙的交界线上，更是壁垒森严。这几天她失望了，去印尼谋生的念头逐渐变得淡漠。这次在电车上与齐鸣偶然重逢，才重新燃起希望。

齐鸣果然费尽移山之力，帮助她到达广州。她自己设法经香港去了印尼。

再过几个小时，两位阔别多年的挚友就要在石函市又一次重逢。这该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啊！齐鸣经过反复思考，决定还是穿那双款式新颖的高跟鞋为好，同时也决定穿上接待外宾的服装。一切准备停当，她才安下心，慢慢踱到刘永茂午睡的房门口。

“老刘，也该起来了把！”

午睡接近尾声的刘永茂被叫醒了，但并没答理，只翻了个身。他上午到火车站送走一批美国人，便赶到机场迎接几位日本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又参加市长的欢迎宴会，任务完成，就回家睡觉了。外办这个单位，一般说来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羡慕者大有人在；看起来个个衣履时髦，来往皆汽车，出入必宾馆，工作只是成天跟“老外”打交道，叽哩呱啦，嘻嘻哈哈；品尝起山珍